

文学理论：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性

□ 南 帆

福建社会科学院 院长室 福建 福州 350001

也许,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更为擅长阐释中国的古典诗文。然而,对于中国的现代和当代文学,道、气、境、兴象、气韵、滋味这些概念显然不够用。许多时候,典型、情节、结构、无意识、意识形态这些概念更为说明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一种新型的现代文学迅速成熟——中国的当代文学迄今仍然沿袭现代文学的基本框架。这是对于新型生活的文学回应。无论是大工业生产、发达的交通系统、大众传播媒介还是瞬息万变的城市生活、汹涌的流动人口、铺天盖地的符号信息,现代社会制造了前所未有的复杂经验。大型叙事文学的崛起显然与这种复杂的经验息息相关。中国古典诗文的审美通常停留于农耕时代的意象,抒情主体与这些意象之间的隐秘呼应构成了独特的情趣,引而不发的节制和妙悟天开的禅意表现出宁静之中的天人合一。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气、韵、境、味以及“脱以形似,握手已违”、“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等均是这些情趣表现的精微描述。然而,面对现代社会的复杂经验,精致的古典诗文已经力不从心;叙事文学兴盛之后,“诗文评”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只能做出相当有限的反应。

无论是全球化还是现代性话语,二者无不表明了一个共有的特征:现代社会的复杂经验既具有纷杂的层面,同时又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科学精神正在成为愈来愈强大的观念,科学判断被视为生活之中的普遍准则。自然科学所研究的自然现象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民族、阶级、国家所形成的意识形态无法干扰自然现象的形态、变化和运动。这个意义上,正确的科学结论是跨民族的。科学精神是普遍主义的最大支持者。相对而言,现代性话语对于普遍准则的热衷具有强大的人为因素。这些普遍准则是降低经济活动成本的必要措施。这不仅形成了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这些准则对于后进地区的格式化已经大面积涉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当科学精神和现代性话语本身业已构成中国现实的

组成部分时,异域文化——当然主要是西方文化——对于中国本土的阐释得到了愈来愈多的成功验证。这种状况显然是历史情景的产物。然而,许多思想家往往倾向于抽掉历史情景的条件依据,借用科学精神和现代性话语论证形而上的普遍主义原则。当然,这个基础之上的普遍主义必定是以西方文化为中心。

文学、文学理论以及诸多人文学科对于隐藏于现代性话语内部的西方中心主义高度敏感。当普遍主义逾越经济学领域扩展为西方式的普遍主义意识形态之后,文学时常对于现代性话语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作为文学的阐释性呼应,文学理论始终对于同质文化的扩张和覆盖保持抵抗的姿态。很大程度上,后殖民批评即是文学理论做出的激进回应。但是,文学理论从来不是以作者的民族出身作为批判的利器,重要的是阐释的有效程度。正如女权主义的批评观点可能出自男性批评家之手,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者乃至掘墓人也可能来自西方文化内部。后殖民等批评学派的出现表明,西方文化内部已经产生出某种文化抗体,这种文化抗体将与西方中心主义为敌。重要的是文学理论知识包含的批判指向,而不是作者的民族出身。这个意义上,我们没有理由简单地回绝一切来自西方的文学理论;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可以视为本土文化的古老标本,但是,许多传统的理论范畴业已丧失与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对话的能力,也丧失了抗衡西方现代性话语的功能。如何摆脱文学理论的“失语”状态?这时,所谓恢复“国粹”往往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姿态而缺乏真正的冲击力。

我们没有理由将中国本土文学理论的民族性狭隘地收缩为中国的古代文学理论。相反,我们致力促成的恰恰是另一个事实:中国的本土能够与“现代”紧密而又合理地联系起来。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现代转化”显出了特殊的吸引力。这是许多中国批评家共同倡导的命题。“现代转

化”的说法表明,批评家已经意识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现代社会的复杂经验之间存在距离;同时,某种理论的“转化”显然有助于克服这种距离,从而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特定内涵引入现代性平台,使之获得与西方的现代性话语进行对话乃至竞争的可能。我曾经指出,这种“现代转化”至少包括两个步骤:第一,解释和转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内部一系列概念、范畴、命题的基本含义;第二,衡量和评判这些概念、范畴、命题对于现代历史语境具有何种意义。可以预料,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相当一部分内容仅仅是一种历史遗迹;因此,“现代转化”所要做的显然是,将那些仍然包含了强大冲击力的理论内容解放出来。

当然,即使对于所谓的“现代转化”抱有莫大的好感和期待,我们仍然不能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视为唯一的资源。构建中国本土的文学理论不仅要吸收中国古代批评家的真知灼见,同时要考虑到“五四”以来众多知识分子的思想探索。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他们已经同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时至今日,“五四”知识分子的许多具体文学见解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两种文化品格。首先,“五四”知识分子的现实敏感性是多数古代批评家所不可企及的。他们不仅深切地感受到底层大众的疾苦,而且敏锐地察觉到历史深部的动荡不安,意识到巨大的革命风暴迫在眉睫。他们及时地站到了新生力量这一边,并且勇敢地为之摇旗呐喊。其次,“五四”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文化采取了一种必要的开放姿态。这种开放并非无条件的膜拜,而是鲁迅式的“拿来主义”和为我所用。他们之中没有多少人乐于炫耀博学,甚至无暇从事学术意义上严谨的“细嚼慢咽”,相反,历史的急迫性驱使许多人匆匆地翻译、介绍和引用,乃至不惮于粗陋和疏漏。这种姿态再度显明,他们并非西方文化的信徒,而是将西方文化作为疗救弊病的另一个资源。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地引进西方文化,这个事实的历史后果迄今仍在延续。当然,各种极端的观点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例如,断言汉语是落后的文字,必须予以废除;或者,认定西方的“声光电化”乃“奇技淫巧”,决不染指,如此等等。恰当的文化开放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然而,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之间的主从关系以及实际比例始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焦点。从“为我所用”到“崇洋媚外”,二者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在我看来,没有必要对于西方文化的各种理论概念如临大敌,中国的文学理论应当拥有海纳百川的气度。一个思想的大国不至于那么轻易地被几个异域的概念攻陷。相反,不同理论体系的概念、命题时常提供了各种视角的补充。然而,引进各种西

方的文学理论必须遵循一个重要的原则:这些理论的意义是再现和阐释“中国经验”及其意义,而不是将“中国经验”剪辑为迎合西方理论预设的例证。换言之,“中国经验”是一个不可代替的中心词,必须由这个中心词构成理论场域的制高点。相对于众多理论话语作者的民族身份,作为阐释对象的“中国”对象远为重要;论证的合理与否远为重要。我在《现代性、民族与文学理论》一文中如此表述:“由于中国经验的坚固存在,西方文学理论仅仅是一种阐释而不能越俎代庖成为叙事的主宰者。‘现实主义’或者‘浪漫主义’这些强势概念曾经导致理论家削足就履地改写中国文学史。只有中国经验的独特结构才能抗拒西方文学理论的强制性复制,扰乱知识与权力的既定关系,打破普遍主义的幻觉。这常常使中国经验与西方文学理论的遭遇成为一种戏剧性的彼此改造。各种挪用、引申、误读或者曲解之下,西方文学理论出现了变种或者混杂,从而丧失原有的一致性和理论权威,出现所谓的‘杂质化’。这时,中国经验可能在多种阐释体系的交织之中显现,并且与众多经典论述相距甚远——然而,这恰恰与本土血肉相连。”

或许,现在已经看得更为清楚:本土或者中国经验并非静止的,所有本质主义的固定解释都有可能丧失效力。各种现成的理论必须在持续的变化和挑战之中不断地自新。中国经验是一个真实的物理空间、文化空间和心理空间。从语言、宗教、风俗到伦理道德、饮食习惯、建筑风格以及特殊的审美观念,中国的传统文化始终活跃在这个空间。唐诗、宋词或者《三国演义》、《红楼梦》从来就没有离开我们的生活;文以载道、不平则鸣、传神写意、为情造文这些命题也从来就没有离开中国的文学理论。尽管如此,我所要强调的仍然是中国经验的创新之处。20世纪80年代迄今,中国的社会历史正在发生极为深刻的转型,持续的震荡波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许多未曾命名的社会现象、生活方式、精神意识纷纷涌现,以至于各种现成的经济学或者社会学理论逐渐失效。作为社会文化最为灵敏的雷达,文学截获了这些内容,并且尽量给予完整的表现。某种程度上,这是文学参与历史转型的特殊方式。与此同时,从杂志、报纸、书籍到电影、电视、互联网,文学的传播工具也在发生革命性的改变。总之,各种未定因素正在向文学领域集聚。中国经验的文学显形隐含着各种生气勃勃的可能形式。这个意义上,文学理论必须做出积极的回应。这种回应的内部包含了如下两个方面的张力——开阔的理论视野与聚焦于“中国经验”的轴心。在我看来,这即是现今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性。

■ 《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第3期,约16000字